

中医难

路辉 著

——现代中医学学术史现状调查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中医难

路辉 著

——现代中医学学术史现状调查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西安 北京 广州 上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医难:现代中医学术史现状调查/路辉著. —
西安: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2017.5
ISBN 978-7-5192-2975-7

I. ①中… II. ①路… III. ①中医学—医学
史—研究—中国—近现代 IV. ①R-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09843号

-
- | | |
|------|---|
| 书 名 | 中医难——现代中医学术史现状调查
Zhongyi Nan
Xiandai Zhongyi Xueshushi Xianzhuang Diaocha |
| 著 者 | 路 辉 |
| 责任编辑 | 冀彩霞 胡玉平 |
| 责任校对 | 王 娟 |
| 出版发行 |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 |
| 地 址 | 西安市北大街85号 |
| 邮 编 | 710003 |
| 电 话 | 029-87214941 87233647(市场营销部)
029-87234767(总编室) |
| 网 址 | http://www.wpcxa.com |
| 邮 箱 | xast@wpcxa.com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
| 印 张 | 31 |
| 字 数 | 550千字 |
| 版 次 |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5192-2975-7 |
| 定 价 | 72.00元 |
-

☆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本公司更换☆

序（一）

护佑我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中医药，现在究竟怎么了？

有人说它退化了，有人说它不断取得成果、在进步。孰是孰非？

我无大眼界。

不知我从事中医药事业近五十年的经历、感受，对回答这个问题是否有所裨益。

我是本书中提到的 1970—1975 年西医离职，学习中医两年以上的 164 个人中的一位。

西医学中医时，正好是本书描述的“第六次医乱”时期。老师讲课时，阴阳一带而过，五行学说因是否糟粕未定，所以不讲。重点讲授的内容是“脏腑辨证”“中药学”和“方剂”。结业后的好处是可用中药处方。虽然貌似多了一个中医手段，但是，别人治不好的病，我也治不了。

由于到西苑医院来看病的病人，都是西医治疗效果不佳的，这更增加了中医的治疗难度。没办法，只好重新学习中医。我曾经用了三四年的时间，把中医学院教材和中药药理学进展的资料都念遍了，然而，治病开药还是效果不佳。彷徨中，决定从根儿上入手，认真学习《黄帝内经》，寻寻中医的根。

问题来了，开始看《内经》时，根本看不懂。为了读懂内经就念了好多书，凡是有关中国文化的我都看，比如《论语》《大学》《中庸》《孟子》《韩非子》《山海经》《道德经》《庄子》《道原经》《易经》等。我甚至念了佛教的几本经典，如《金刚经》《楞严经》《心经》，念这本不懂再念那本。其间，学习了李杨波、倪海厦先生的相关著作。

念了十来年，思维改变了。我不是学到某一个特效方子、某一个秘藏技术，而是临床思维改变了，慢慢地，能用中医的思维来指导开方子了。我找到了中医的根——“阴阳五行是中医的根”（中医影响世界论坛（2012.6）北京专题会议发言题目）。

我通过以上学习认识到：中医学、西医学都是人类和疾病做斗争过程中产生出来的生命科学，但两种医学的哲学基础、思维方式不同。

“西医的机器人观则决定了西医人体只是一部机器，顶多算是一部超级精密、超级复杂的机器而已，还是机器。机器人没有情感和思维，机器人只有不同空间尺度的零件，哪个零件坏了，就修理，修理不好，换掉，查缺补漏、疏通管道，仅此而已。看看西医的治疗手法

和治病逻辑，就是如此。西医认为，心理性疾病、精神性疾病，也只是蛋白质机器人零件发生故障的表现而已。西医蛋白质机器人观与中医天人观的生命观是完全相反的，中医天人观是从源到流，西医机器人观是从流到源。这一点与二者的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是完全吻合的。”（路辉语）。

中医学在“道”和“阴阳”的统率下，站得更高，已被证明能解决一部分西医尚不能解决的问题。生命，在时间上表现为生、长、壮、老、已的运动展开过程；在空间中，人体生命之“气”时时刻刻与天地之气进行着交流、沟通，实现着内外之气的动态平衡统一。人自身也是自然演化的产物，与天地自然之气息息息相通。

人体是一个小宇宙。生命系统对其环境是开放和不断相互交流的，中医以“出入”和“升降”描述生命系统和环境的交流。“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素问·六微旨大论》）。

“中和”是天地自然和人体的正常状态，人体有巨大的自我修复和恢复的能力（自愈能力），中医主要依靠人体自身的“正气”战胜疾病。气之“和”乃是中医治疗的最高价值目标，也就是求得人体这个自组织的开放性复杂巨系统的“有序”，应重视恢复和重建人体自身抗病能力。

中医气化的形成机制是“升降出入”，自然界与人体的气化都“化不可代，时不可违”，应“无代化，无违时，必养必和，待其来复”。无论医病或养生，都要“各从气化也”（《素问·五常政大论》）。医生的作用仅仅是因势利导、调整阴阳偏胜，顺应这种修复、恢复能力而已。在养生、治病过程中，始终要把人摆在第一位，着重强调人体的“正气”，“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刺法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素问·评热病论》）。

人应顺应自然、顺应四时。“上下相遘，寒暑相临，气相得则和，不相得则病；……从其气则和，违其气则病”（《素问·五运行大论》）。对待用药治病如同对待战争一般，是不得已而为之，如“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道德经》），用药中病即止，余者“必养必和，待其来复”（《素问·五常政大论》）。

经过一段时间的中医经典的自学，自觉于真中医刚刚得窥门径，尚未登堂入室。正准备计划下一步要再花费十余年弄明白“阴阳五行是中医的根”之所以然，今年初，我发现了路辉先生的《无极之镜》，如获至宝，初读之下有醍醐灌顶之感，这不正是我想再花费十余年想要学到的东西吗？不正是“阴阳五行是中医的根”的所以然吗？路辉先生首次证明阴阳不是“朴素的唯物论”，五行也不是“初级辩证法”，阴阳五行不是什么哲学名词，而是以中国古天文学为基础的科学。

以上的经历让我觉得，现代中医把中医的核心和灵魂当作封建迷信丢掉了。路辉先生说：“古中医体系有两种思维：一种是定性思维，就是我在前文所说的中医思维模型，不再赘言啰唆；一种是定量思维，就是中医理论中天干地支、五运六气、四时五行理论，在年月日时的时间与空间层次上的内算系统，这也是我要在后续的《古中医运气学·天地之机》《古中医藏象学·不朽之身》《古中医内算学·伤寒之术》《古中医宇宙学·众妙之门》《古中医史·天璽之门》中所要详细说到的。”这两种思维模式的有机互应、有效结合，就是古

中医体系的本来面目，这个认识过程就是真正的古中医思维方法。

我们期盼着路辉先生的《古中医运气学·天地之机》《古中医藏象学·不朽之身》《古中医内算学·伤寒之术》《古中医宇宙学·众妙之门》尽快出版，并能验之于临床。

2013年6月，我在中医影响世界论坛北京专题会议上曾说过：我们的“国学大师”们在外来侵略的坚船利炮面前，偏激地否定传统文化，有人还要废除汉字啊！汉字没有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怎么去继承啊？还有一些“国学大师”对我们中医有不少的非议。当时，我提议或者是建议我们中国文化界，适当的时候应厘清这些问题。今天欣喜地看到路辉先生在《中医难——现代中医学学术史现状调查》（以下简称《中医难》）中说透了这些现象。

《中医难》一书，列举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对于中医今日之退化条分缕析，指出其缘由，利于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利于今后中医真正的复兴。“爱之深、痛之切、责之也重”是我读《中医难》的感受。

我一直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们中华民族自有史以来，无论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都一直处于世界前列，只是近几百年来落后了，近几十年我们正在奋力赶上并已初步达到预期目标。当下对中医药，国家支持、人民需求，加上中医药从业人员的奋发图强，我看好中医药的复兴！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麻 柔

丙申年初冬

序（二）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震古烁今。三皇五帝，轴心时代；五霸七雄，儒道传诵；秦汉兵马，世间风云；唐宋风骨，文明高峰；元明疆土，欧亚称雄；康乾盛世，天下大同。五千年以来，中华民族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作自卑！

但是，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文化强势涌入，在汹涌的西方文化浪潮面前，某些知识精英对于中国固有文化的信心轰然崩塌。李鸿章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急于应对中，中国人逐渐患上了民族文化自卑症……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西方文化如日中天的时期，西方人依靠着他们的“国力”和“国威”，对世界经济和政治市场进行着大规模的侵略、霸占和组织化。同时，在宗教信仰、礼仪习惯、语言等方面，也朝着形成一个巨大的“西方式世界图景”的方向前进。面临这般突如其来的欧风美雨的袭击，东方世界一方面遭遇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惶惶不安，无所适从；随之，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追随着西方的脚步，被动或主动地进行近代性启蒙和文明替代。在此过程中，悠久的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经历了文化心理上的巨大落差，从“天朝上国”一下子跌落到对民族固有文化自卑、自责甚至自暴自弃的低谷。

钱穆先生对这种现象就有过犀利的批评：“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无论在政治、学术、军事、工业，一切人生的各方面与各部门，实在够不上说有雄心、有热情……他们似乎用的自我批评的理智的成分太多了，而自我尊重的情感的成分则太稀薄了。他们并不想做第一等的人与第一等的事。至少在世界的场围里面，他们是谦谦不遑的。救亡与谋生，是这一时代最高的想望。模仿与抄袭，是这一时代最高的理论。”

主张铲除中国本位文化，代表人物就是胡适。胡适在美国留了几年学，回国后就以西方文化的代表自居。他直言不讳地说，如果把中国文化比作是一棵树，那么，他要做的就是把这棵树连根刨掉。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在《信心与反省》一文中，胡适更是对中国文化做了全面抨击，把中国文化说得漆黑一团，一无是处。胡适说得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月亮都是美国的圆”。当时，崇洋媚外成了

潮流，有些名流给教育部写信，要求取消汉字教育，所有学校不许写汉字，不许看汉字书，一律改用英文或者法文。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取消汉字，无异于斩断中国文化的血脉。其后的所谓新文化运动急先锋们，甚至包括当时的一些所谓的“国学大师”们，都在极力鼓吹着取缔中华文明的聒噪。

王阳明说过，“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把自己家里无尽的宝藏给扔了，却效法那些讨饭的孩子，这不挺可怜吗？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了自己的文化，这个民族是名存实亡的。据了解，从近代到1949年的一百多年间，基督教在中国传了七十万信徒，一些早期来华传教士，信徒寥寥，但他本人反倒钻研和翻译儒释道经典，成为很有造诣的汉学家。如著名的德国传教士卫礼贤，甚至成了虔诚的孔教徒。

形而上者渐行渐远，形而下者愈来愈实。

西学东进的一百多年里，中国人在“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的空洞争论中，在未能厘清科学、哲学、国学等概念内涵的前提之下，对东西方文化与科学在当代中国的组合与重构这一历史性重大课题，至今没有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而且在此期间，中国人普遍患上了民族文化自卑症，尤其在近代哲学贫困与迷信近代科学主义思潮困扰下，对自己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长达百年的自残与自虐。

这场文明交锋的结果，大家有目共睹，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历史进程，从打倒孔家店、废除文言文、取消中医等一系列的行为中，泱泱中华的五千年古文明逐渐消失殆尽。直至现代中国，还都是“西方的月亮圆”的世界观、价值观，这是中国人的不自信，这是中国人的自卑。

日本可以说是西化最彻底的国家，但保持的民族性却特别强。初春的“樱花节”，日本女性穿着昂贵精致的和服，踏着木屐，一步三摇，在阳光灿烂盛开的樱花丛中漫步，吟诗饮酒，溪水流觞，那是多么明显地持守着中国汉唐遗风。日本人还保存着我国汉唐传统文化的精华，我们自己为什么就唯恐避之不及呢？为什么中国仅仅学会的是数典忘祖的全盘西化？日本已经成为西方看东方——远东的代表，韩国亦是如此继承着中国元明文化的精髓。而中国却在因为急于西化而不断丧失自己的文化身份。其实，恰恰失去的就是这份文化与文明的自信。

由民族文化自卑派生的哲学误读与对科学的迷信，是近代中医学术发展的两大障碍。

近一百多年来，国人固执地相信用西医的方法可以发掘和提高中医，这样做的结果，使中医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许多中国人表现出不可理喻的民族虚无主义，中医界人士也是如此，不承认自己民族医学的科学性，不认真评价并确定中医的价值，一味追求时髦，用西医的标准和术语改造中医、扼杀中医。可悲的是，当前，这种状况还在继续恶性循环。

我们长期以近代物理学、化学的观念与方法，作为评价中医学术是非的至上信条和唯一标准。在中医事业发展上，游谈无根的口号天天在喊，中医西化的路子天天在走。辩论中医是否科学的调调，就是中医西化背景下哲学误读与对科学的迷信的一种变调。这种言论必将使混乱的思维更混乱，不堪的中医更不堪。从根本上说，西医学还只是一种典型的生物学或动物医学，还远没有发展到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医学。它将针对老鼠的实验结果应用于人

类。须知，人类与老鼠毕竟有天壤之别。西医说的人是形而下之机器人，中医说的人是形而上之天人，两者有云泥之分、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

须知，科学是科学，但科学不是唯一的科学。

世界各民族的传说中都有自己的医学之神，寄托着人类对守护生命健康的永恒向往，对苍生大医的虔诚礼赞。中医的医神有岐黄、神农、孙思邈等，西医的医神是最为著名的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之子阿斯克勒庇俄斯：半人半马，蓄着胡须，手持蛇杖（后来成为西方医学的标志），善治伤残痼疾，且能起死回生。然而，西医医神的这柄蛇杖最后竟然成为一些中医药大学的校徽标志，西医的医神护佑着中医的理论与实践，不知道这是误读，还是现代中医对自己的不自信？



一个学术机构的徽标展现的是这个学术机构或组织对其学术范围的高度概括和精华再现，而某些著名的中医药大学的校标则完全与此背道而驰。再看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局徽，是一个具有浓郁中国风的蓝白十字，暗含着红十字的国际医疗标志。其中，唯一能体现中国元素的就是中国风花纹，而中医的特色则毫无体现，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现代中医界对中医的理解还不够，我们对中医的继承和发展还任重而道远。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医被西化的歧途逼到了即将消亡的边沿。与此同时，学术造假、不讲真话的现象已经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明明是在中医西化的误里造成了中医基础科学与临床技术体系的不断扭曲与解体，却美其名曰是中医科学化、现代化、标准化、规范化的“重要途径”；明明知道中西医结合名义下的中医西化是一条走不通的路，却偏偏要将它说成是“硕果累累”，而且至今仍在误导后人向中医西化的无底洞里不断地交着“学费”。中医在原生态文化氛围里按照自身内在的科学原理自主发展，至今依然是中医界学子的一种奢望。



西方医学界的反思从 20 世纪 60 年代就开始了。当时，卡尔逊发表了《寂静的春天》，揭露在农业中农药和化肥带来的祸害。医学界发现，所谓抗生素相当于农药，激素、维生素相当于化肥，所以人们就警惕了。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一主要来源于药物的不合理的使用，即医源性疾病。1973年，以色列全国医生罢工，为期长达一个月，根据耶路撒冷埋葬协会的统计指出，该月的全国死亡人数下降了50%。1983年，以色列医生再度罢工，为期长达85天，死亡率则下降了50%。而现代中医这时却无视西医的局限与弊端，仍对西医毫无理智地趋之若鹜、趋炎附势。1977年，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与内科学教授G. L. Engel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不仅关注人的生物性，同样关注人的社会性，充分认识到环境因素、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对健康的综合作用；而这种思想实际上就是中医的“天人合一”思想，而且，中医的思想要比西医的医学思想深邃得多，但现代中医就是视而不见，一味地讨好西医的说法。

德国慕尼黑大学曼·波克特教授是著名汉学家与医学家，既熟悉西医，又坚持研究中医几十年。他在接受《科技中国》记者的专访时说：“我一再强调，中医是一门成熟的科学。这是我几十年研究得出的结论。”他说：“中国自己不把中医学当成科学，不重视中医药的发展，其根源是文化自卑感。中医是一种内容最丰富、最有条理、最有效的一种医学科学。而西医学的发展只有几百年的历史，大踏步发展只有几十年。”

曼·波克特教授说，近一百年来，许多人固执地相信西医的方法可以发掘和提高中医，这样做的结果，使中医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中医在为自己的生存寻找依据时，却“忘掉”了自己的话语，而是费力地求借另一种话语系统，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为什么？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医与西医不能简单地、机械地用“先进”与“落后”来定位……譬如，能说太极拳比广播体操落后吗？能说京剧比西洋歌剧落后吗？能说国画比西洋油画落后吗？能说二胡比小提琴落后吗？

2014年，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李慎明在《中国中医药报》撰文指出，中医思维弱化，中医评价西化，中医学术异化，中医技术退化，中医特色优势淡化，是我国中医学术领域普遍存在的问题。我宁可相信一个局外人的旁观者清，也不相信一个现代中医人的当局者迷。为什么国家长期以来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扶持和促进中医的发展，反而出现了如此尴尬的局面呢？

因为文化的自卑。

中华民族如果在21世纪仍处在文化自卑中，我们就永远找不到自己的核心价值。纵观世界历史，没有看见任何一个国家把别人的语言变成自己考大学、考研究生、考博士的硬标准，而我们国家做到了。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个国家的著名学者提出“打倒古希腊”“打倒古罗马”“打倒苏格拉底”“打倒柏拉图”的口号，但是我们曾有过“打倒孔家店”。

2012年，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有一个统计数字，从1900年到2000年，中华民族究竟翻译了多少外文资料？100680多册。而西方诸国在20世纪翻译了中华民族多少著作？仅800多册。文化赤字差了100倍，什么原因？中国和西方思想文化没有平等对话，西方对中华民族有隔膜，目前这种状况还在持续。诸如此类的做法，这些都是文化以及中医极度自卑的体现。

百年来，传统文化与传统学术所承受的打压和破坏，不仅源于西学的冲击，而且源于文

化自卑的心理基因与急功近利的历史短见。那种过于自卑、谦卑的做法，不仅全面打破了中医学自身发展的规律，而且人为地毁坏掉了一种千年铸就的学术风格及学术方法。今天，人们之所以难以企及传统的文化，恐怕不仅仅是文化背景的转换，通往文化深层的文明核心的门径如果因为开启的钥匙出了差错，那么门外说禅的事情是常有的，怕就怕在那些“野狐禅”居然被历史虚无主义者、中华文化自卑者当作是文明修行的不二法门。

当然，极度的文化自卑就会出现自负，正所谓物极必反。近现代的中国学术界到处都充斥着各种“大师”，国学大师、史学大师、中医大师、儒学大师、养生大师等。

或问，何谓大师？大者，传道也；师者，授业解惑也，此为大师矣。传道者，传天人之道理，传释儒道之道，传古浑盖宣之道。此为天人终极之道，古中医道为天人道之一端耳。授业解惑者，道之流衍也，世间各种分业的理术之流，医术为百业之一技耳。通天人之道，晓百业之术，悟人天之感应，此方为大师矣。反观世间，动辄以各种“大师”相称，殊不知有几人可堪匹配？

中国文化曾深刻影响西方文化，其影响有的甚至大于西方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影响。

物质文明方面，四大发明，我们就不说了，古代化学、天文、物理、水利、农业、建筑，我们就不说了，李约瑟在《古代中国科技史》中已经说得很详细了。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对欧洲的影响举世公认。这种影响不只是物质的，而且包含丰富的精神价值。

自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2世纪，中国丝绸源源不断通过“丝绸之路”运往欧洲。这一时期，通过丝绸贸易，中国文化对西方产生了第一次重大影响。公元前5世纪左右，中国丝绸织品作为古希腊贵族的服装出现在希腊雕像上。当时，西方人对中国丝绸赞叹不已，把中国称作“赛里斯”，即“丝的国度”。丝绸的薄、软、轻和随物赋形的特质，与古希腊人树立的并为后代西方人所推崇的追求人体自由的要求相一致。丝绸以其物质特性对西方美学理念做了很好的诠释。从文艺复兴时期直至近现代，丝绸始终是中国向西方出口的大宗物品。

瓷器是体现中国文化对西方影响的又一主要载体。瓷器生产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但由于其比较脆弱、不便陆运的特性，在欧洲极其昂贵，个别上层人物以拥有它为炫耀的资本。后来，随着东西方的主要贸易通道由陆上改为了海上，为西方大批进口中国瓷器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到17世纪末，每年从广州、泉州等地发出的瓷器船货达300万件之多。中国瓷器所表现出的精巧、细腻、华丽的风格催生了崛起于法国的“洛可可风格”，连西方学者也不得不承认，“洛可可艺术风格和古代中国文化的契合，其全部秘密就在于瓷器所体现出来的纤细入微的情调中”。

精神文明方面，中国古代哲学和艺术对西方的影响一样举世公认。儒家、道家、禅宗等思想理论，一直影响着从启蒙主义时代至今的西方思想界。文学艺术的影响力尤为显著。元杂剧在18世纪曾一度风靡欧洲，借用中国素材来创作戏剧成为时尚。

如欧洲启蒙时代的先行者就借用中国戏剧来高扬启蒙理性精神，伏尔泰改编的《中国孤儿》在法国上演，轰动欧洲。中国戏曲的艺术手法对西方的重大影响主要在20世纪，以德国人布莱希特的“表现派”戏剧理论受中国京剧的影响为代表。布莱希特长期以来一直想突破西方戏剧理论的藩篱，但缺少实践的佐证。当他看到梅兰芳表演的京剧时，那种以演员的表演力为重心的舞台实践和虚拟性、程序化的表现手法使他灵感迸发，提出舞台实践的“间

离效果”和“打破第四堵墙”两条重要的“表现派”理论准则，从而奠定了戏剧中“表现派”的地位。戏剧（戏曲）表演，西方重“体验”，东方重“表现”，布莱希特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以中国戏曲的长处弥补西方戏剧表演的不足，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当运用水墨画在宣纸上的中国画出现在西方时，这些以画山水、花鸟、动物见长的中国画恰好和以画人物见长的西方油画形成互补，一下子就吸引了西方人。中国画的风格对法国画坛逐渐产生了影响，出现了不少具有中国风格的风景画。中国画的写意风格真正渗入到西方画家的创作美学中，是在19—20世纪之际，成功的画家有马蒂斯、毕加索等。马蒂斯的抽象派是从他老师莫罗的野兽派的“东方风格”中发展而来的，毕加索的立体派是按照“洛可可风格”的方向进化而成。其他以写意为主旨的西方现代派画家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中国画风格的影响，他们开创了西方画坛的新气象。其他如儒家的“四书五经”、道家的《道藏》等都对西方文明与科学理念的发展创新都有重要影响。

西方人很早就知道中国的文学故事，这些故事是随着“丝绸之路”上商旅的口口相传辗转流传到西方的。例如，成书于公元10世纪的阿拉伯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的一些中国故事等。

在18—19世纪，随着东西方贸易的增加，大批中国小说被翻译到西方。其中，最有名的当为《好逑传》，陆续出版了十多种译本。歌德对于《好逑传》中表现出来的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协调大为赞赏：“在他们那里，自然界总是在人物形象的周围一同生活着。”这以后，中国许多著名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都被译介到西方。另外，中国古诗生动简练、意象鲜明的简约美学对意象派诗歌产生了直接影响，开启了美国诗歌的新境界。

中国古代的制度文明、科技思想及其成果等对西方的影响也是很大的。随着西方汉学日益勃兴，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给予自身影响的呈现和阐释越来越周详和具体。把握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既不是盲目自大，也不是号召文化本位主义，而是要对中国传统文化保持应有的礼敬和自豪，在文化比较中坚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和发展前景的信念，形成文化自信，摆脱文化不自信的心态；不妄自菲薄，不过分崇拜异域文化，而要在中华文化对外交流中求同存异、共生互补，达到文化自强，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2016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文化自信”这一历史性课题，我们对此也应该有一个新的认识高度和境界了！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路 辉

丙申年丙申月壬戌日乙巳时

序（三）

坦率地说，目前的中医界面对的最大危机不是外来的，而是内在的。正如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所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中医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一定程度上可谓是咎由自取。这一百多年来，中医一直在为自己的生存问题进行一种更多地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抗争。但如果到了今天，中医界仍然不能反躬自省，不从理论体系本身，而只是从生存环境上想出路，恐怕最终仍不能摆脱灭亡之因果。实际上，中医的衰退并不自近代始。自从宋以来，儒医的开端，即是中医内部危机的开始。

医道衰落的一个主要标志——现代中医所谓的辨证论治。

现代中医界有一种思路：把临床的症状加以筛选和归纳，根据主要症状，运用八纲、脏腑经络辨证而处以方药。这种方法与近代的医学思路实已极为相似。但是，这一看似正确的方法其实存在很大问题。

我们知道，首先，同样的症状往往是不同病因的表现，针对症状下药，而不从病因入手，极有可能误诊误治；其次，很多慢性病在一般情况下是没有症状表现的，有些症状只是慢性病的急性发作。因此，解决了症状，不等于治好了慢性病。《鹖冠子·世贤》载魏文侯问扁鹊兄弟三人谁医技最高，扁鹊回答说：“长兄于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闾；若扁鹊者，镵血脉，投毒药，副肌肤间，而名出闻于诸侯。”长兄治无形之病，人皆不晓，故名不出于家门；中兄愈初起之疾，人皆为常，故名不出于乡里；扁鹊疗深危之病，人皆称奇，故名闻于诸侯。声名传播之远近，与医疗水平之高下适成反比。

实际上，除了少数杰出的医家，多数中医所针对的都只是症状。中医多有以症状列为病名者，如头痛、腹痛、胃脘痛、自汗、盗汗、失眠等，便证明了这一点。这说明，传统中医对病的认识是非常模糊的，意味着它存在着很大的漏洞。许多中医的革新派想把中医的症状学判断和西医的疾病诊断结合起来，如把糖尿病归为消渴。殊不知这种结合非常可笑，因为糖尿病初期并不一定有症状，而消渴也并非都是糖尿病。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知识准则，尤其是西学思维方式传入中国，这种症状学的思路不但没有得到反思，反而进一步被强化了。近代以来，国人爱讲“科学”，又常把科学归结为归纳和演绎二法。其中，归纳法尤其受到重视。这一思想氛围有利于此前中医固有的症状学

解决方式而不是真正医道的遗存。更重要的是，在西医的步步紧逼下，中医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得不采用西式的思考方式。很多中医执业者，初入门觉博大精深，但一到临床，却又或多或少地否定中医，自觉不自觉地使用西医理论指导临床用药，直至行医数十年后，当年届四五十岁时，才猛然发觉西医认识之偏、用药之弊，然后再回过头来重新认识中医、研习中医和肯定中医，这成为中医界有趣的四十岁现象和五十岁现象。

在模式化和分科细密化的“现代”思维标准的大前提下展开的“中西医结合运动”，从开始就注定了它绝非中医的福音。目前的中西医结合的实质，是以西医化解中医，确切地说，是以西医的思维方式改造中医。

现在，我们到中医医院去，有不少医生不把脉，而是和西医院一样，开一张检查单，等各种各样的检查、化验结果出来以后，再据此开中药处方。似乎中医即等于中药。可是，中西医最大的差异不在药物，而在于对疾病的理解方式。因此，坦率地说，今日的中西医结合，更多地是以西医为主、中医为辅的所谓的“结合”。

医道衰落的另一个标志——中医的派系化。

实际上，真正的医学是不应该分派的。所谓的“派”，起初是医生对某一点认识的深刻化，而后进一步将此认识发扬光大，就对某种诱因产生的疾病形成了认识。但是，如上所述，各种派别的理论，其实均只是对一时之症的认识，如果脱离了具体的时空条件，一味地强调运用某一派别的理论解决问题，便很有可能导致天人观的丧失。

在医道层次上，在科学的基础理论层次上，中医没有流派之分，也不需要流派。在医理、医术层次上，中医流派是经验中医的产物，是传统中医不成熟的标志。而例如黄帝学派、扁鹊学派之分，则完全是后人不懂装懂，人为划分的主观逻辑，与历史客观事实不符。

中医体系，无非两点：一是理论，一是临床实践。中医理论具有发生学特性，后世的中医发展无不以“经曰”为荣，但由于在中医理论上理解的差异和高下不同，故在临床实践上就显现出医术的不同，这就是医疗经验的差异，从而形成不同的中医流派与学派。中医流派与学派形成的根本原因，就是传统中医体系的不成熟，所以，导致一千个人有一千种中医的理解。就目前的中医理论继承与研究现状来看，传统中医体系是经验式的医学，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以医术之异而形成的医派，是离不开经验的结合和承传的。民间医学的师傅带徒弟的传播方式也离不开“经验”二字。所以，历史上出现了那么多的《经验方》《集验方》等各种方书。

中医流派的产生，说明了对中医基础理论的理解出现分歧与蒙昧；中医流派的泛滥，说明了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应用出现了混乱。金元以后，纪晓岚所谓的四大家为流派之始，亦实为中医堕乱之滥觞。现代中医西化理论的出现，标志着中医流派的灭尽，这从反面论证了中医本不应分帮分派，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基础理论的烟消云散。其实，完备的中医科学理论体系就在史上的文明史中，但囿于术业有专攻，在医言医，不敢越七衡盖天雷池一步，遂医道渐隐，医理渐乱，医术渐成流派，流派一成，中医大乱。时人不识此乱，更沾沾自喜，以为天下我为第一，舍我其谁？殊不知，因为没有统一的中医理论体系，才出现类似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所谓“百家争鸣”的中医乱象。当然，这也不完全是医者的本意，更是中医史学者的无知与无畏，标新立异，哗众取宠，满篇意淫。中医史学者的智慧与学养不够，终成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中医江湖史、中医派系史。

先秦时代的地方医学派别，大概只能在医术的高下上彼此竞技，结果却出现了扁鹊在秦国为秦医有势力者所暗杀的残暴事件。从那以后，身处民间医人们的竞技，事实上成了他们医术的互相保密，私相授受，自生自灭。《伤寒论·序》中说：“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这其中的“各承家技”指的就是中医流派的经验式传承，“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是中医流派的痼疾。张仲景的伤寒学说一出，到了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医人那里，竟藏于秘囊之中，占为私有，大家彼此防范，中医流派的最大特点就是择人、秘传、传男不传女，最后失传。试想，如果有一套规范的中医体系在那里，还需要秘传、单传吗？可见，传统中医传的不是中医科学理论，而是中医经验。

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提到：“医之门户始于金元。”谢观在《中国医学源流论》中亦说：“北宋以后，新说渐兴，至金元而大盛，张刘朱李各创一说，竞排古方，犹儒家之有程朱陆王。”当然，宋代私人书院讲学风气所带来的门户之分，势必也影响到医之门户。所谓“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的说法，实际上，就是讲的这种影响。另外，还由于印刷术的发展，带来了书籍的广泛流通，使知识传播变得容易，这也有利于医学理论的交流。但实际上，中医流派的形成并不是从金元以后开始的，而是从诸子百家大混乱时代就开始了。中医流派的产生有天时、地理、人为三种因素。天时，我们在大司天流派、小司天流派中已经详细论述了中医流派产生的天象机制；地理，在不同经纬度的坐标系中、不同高下南北西东的地理位置中，九宫九州岛分野不同，地气的九宫飞星之气是不同的，这就导致了人体先天体质的不同，或称谓、禀赋不同，同样会产生不同辨病治疗方法的学术流派；人为，其实，中医理论基本上还是以内难伤寒为主线，根据不同天时、不同地理而有不同的领悟与实践。天时、地理、人为等，都是中医理论体系中的某一章节，这才是全璧。“传统”中医只是在断章取义、以偏概全，导致一病、一方、一药、一论、一地、一时都可以成为一流一派，不计其余。这本身已不是理论范畴内的事了，完全是江湖上的那些九流之论。

刘河间的火、李东垣的土、朱丹溪的阴、张景岳的阳等都是相互迥异的学术观点。张景岳一出来，就既反对刘河间，又反对李东垣，就连朱丹溪也都被攻击到了，因为朱丹溪的那一套也是从刘河间演变而来的。南派医学内部发生争执的是清代康、乾时期的叶天士与薛生白，他们都同时是吴中享有盛名的医人，都以温病立论而修改了张景岳的观点，但不知为什么，两人攻讦得非常厉害。两人之间颇有“既生瑜何生亮”的遗憾。据《吴中名医录·薛生白传》中记，叶、薛同名于时，常互相抨击，但薛氏每见到叶氏处方面善，未尝不击节称叹。他们在医学观点上倒似乎相当宽容，反过来，也见得两人的争论十有八九是互相较艺不服气的意思。由此观之，尽管叶、薛两氏都是吴门医学的顶尖人物，但对于医学的竞争，在学术上已没有多大意义，这是中国医学流派走向末流的征兆，中医医学到了这一时期，已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

吴鞠通也反对门户之见，曾鲜明地阐述了为医而立门户之见，褒己贬人，轻视同行，或明知有错，也隐忍不说，导致“杀人”的不道德行径。他批判唐以后名医之法，可采而不可宗，正是因为各家的门户偏见。批评东垣、丹溪、河间等人，各以一偏之见，各立门户，以成一家之名。指出他们往往谬于一家之言，入者主之，出者奴之，严重阻碍了中医学的发展。更有甚者，多为门户起见，盖欲天下人之病人就其学术，并非以我之学术救天下人之

病。生命非儿戏，试问，岂可执一家之书以医病哉！

随着中医学术之乱的加重，一味药都可以成立一个所谓的医派，最后在中医江湖之中，哀鸿遍野，一地鸡毛。民国以后学术思想的混乱慢慢开始沉寂，趋于灭尽。今天，现代中医学术多偏重于方法论的共性，而缺少理论的共性。现代中医被笼罩在“辨证论治”这一个声音之中，这种所谓的学术共性，不是中医理论的回归，反而是中医方法论的变异，这种变异正是中医流派经验式的自身繁衍，最终导致中医理论的失传，从而出现方法论上的虚假繁荣。现代中医理论界在理论上找不到方向，于是只能寄希望于中医流派曾经的热闹景象，甚至还衍生出一个不伦不类的某神派，而几乎所有的现代中医都趋之若鹜，以为又找到明灯了，事实上，不过又是一个泡影罢了。

医道衰落的第三个标志——将中医理论与中医方法论等同或混淆。

现代中医的一个特点，就是将中医理论与中医方法论等同或混淆。我们经常能听到现代中医说辨证论治、整体观念、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方证对应、治未病等是中医理论云云，其实，稍微想一下，就会明白：首先，这些“理论”并不是理论，而只是方法论。方法论是认识事物的方式、方法、途径，与事物本身没有直接关系，条条大道通北京，看你是从东南西北哪条道上来，而北京只有一个北京，不会因为来的路不同而有所不同；其次，这些现代中医的“理论”，西医也同样都有，西医也有辨证论治（对因治疗）、整体观念（四大组织、五大器官、八大系统）、同病异治（如肿瘤可以有支持疗法、化疗、放疗、热疗、基因疗法、生物疗法）、异病同治（激素、免疫抑制剂、抗生素可以治疗各种相关疾病）、方证对应（对症治疗）、治未病（例如，高脂血症、糖尿病、腔隙性脑梗死、肾功能不全、贫血、肿瘤等初期经过体检发现但没有临床症状的治疗，与西医的类似补充善存、微量元素等等的养生）。可见，中医的高大上“理论”，西医同样也有。

究其根本原因，是对中医史的不清楚，对中医体系的不明白，对中医法术的一知半解，对中医基础理论的懵懂，对中医物理机制的一片茫然。中国传统文化讲究道、术之分。道是形而上者，术为形而下者；道是总的原理，术是具体运用，不知道则无以知术。中医亦然。对于中医而言，必须理解真正的医道，而不能只在医术上找着落。否则必死，不是死于古人，死于权威，便是死于“科学”，死于西医。

真正的中医现代化，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走出症状学的思考方式，回到“医道”传统，实现中医界的反思、反省与救赎，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乏“清理门户”的意味；二是站在一个平等的地位和西医对话，矫正今日这种以西代中、废医存药的中西医结合运动，实现二者的真正结合。这不但有利于中医的发展，对西医也不无益处。实际上，所谓中医和西医不过是限于我们今日的认知水平的一种表述。在“治病救人”的意义上讲，医学只有方式、方法的不同。中、西医乃至其他一些医学，如藏医、蒙医等，都是基于对自然和人体的认识而建立的。当我们对疾病的认识更为深入的时候，这些医学均可找到结合点，互为所用，而不应有什么对立。在上述两个方面中，对医道的认识是最为基本也是最为迫切之事。而摒弃中医派系之分，回归中医基础理论的全方位系统构建，是中医界的当务之急。经曰“智者察同，愚者察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确实不易。

中医的自强，需要中医自觉、自立、自信，能正确认识自身的不足和缺陷，有刮骨疗伤的勇气，有沉下心来浸淫中医的意志，有不为名利所惑的超然，还要有一套正确认识中医的

逻辑体系。如此，中医自强才有尊严。那些靠政策、靠对骂、靠施舍、靠坐吃山空、靠阿 Q 式的回忆辉煌而得来的所谓的“尊严”，不要也罢。总有人说，中医这不行、那不行，其实，不是中医不行，而是中医人不行。同一个中医体系，有的人就成了开宗立派的大师、徒弟徒孙簇拥的专家、患者点赞的医匠，有的人却成了庸医、蠢医，甚至骗子，这说明了什么？还是人不行嘛，与中医何干？我们社会现在有一种严重的错误倾向，一提到阴阳五行，马上就想到大街上算卦的那些阴阳先生、算命先生、神婆巫汉等。但是，在阴阳五行体系里也照样出现了那么多的圣人大师啊，老子、孔子、董仲舒、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邵雍、刘伯温等。在熠熠生辉的阴阳五行朋友圈里出现几只苍蝇，也算是正常的。就像同样是现代科学的数理化教材，同一所学校、同一批教师教授，为什么一个班里有的同学可以上清华、北大，有的同学却一无所成呢？你不能因为这个科学体系中教出了几个一无所成的，就说这套科学体系是错误的吧！同样道理，中医也一样。所以说，中医当自强，更重要的还是中医人要自强！

本书《中医难》，说的是中医之乱。如果纯粹是中西医结合学派、新中医学派、现代中医学派，均与本书观点无关，但如果要以发展中医、研究中医、继承中医之名，来行走中医江湖和中医学术界，那就必然与本书有关。中医乱的根源就是西学中，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西医思维掌控中医研究一直都在赤裸裸地、肆无忌惮地进行着。我们不是说西医不好，也不是说中西医结合不好，也不是说现代中医不好，它们都有各自的医理和医术，在各自的领域的里都没有问题。但医学有层次之分，中医属于医道层次，体现的是天人之理；而西医、中西医结合、现代中医都是自然科学范畴内的医理和医术层次，体现的是格物之理。所以，一旦这些格物医学要以研究中医、发展中医之名来说中医的事，用小学的知识去解释大学的知识，则必然是错误的、不适宜的，是不可能成功的。各自在各自领域里发展，没有问题，没有对错、好坏之分，不要越界、不要干涉内政，本书说的就是这个事，但请不要以中医之名。所以，建议中医同人们好好把本书精读一遍，思考一下，对于现代中医的发展方向很有好处。曹操读陈琳之檄而头风自愈，范进遭丈人之掌掴而痰出心窍病愈。现代中医们也应该学会把有毒的药材配制成有逻辑、有疗效的方剂，也来一剂承气、四逆、白虎之类的汤液。大毒治大病，小毒治小病，无毒不治病。

本书，我说的是中医那点事，与纯粹西医、中西医结合、现代中医等新医学流派无关。但请不要冒犯中医，不要诋毁中医。

如果把中医比作一棵硕果累累的大树，那么，中国传统文化是其生长的土壤，这片土壤就是《无极之镜》中的中国古天文逻辑，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基础科学体系是其根本，以《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体系是其主要枝干，而内、外、妇、儿各科的治疗及其方剂、药物等则是其分枝、花叶与果实。从历史与社会学角度上讲，中医是紫杉醇名木，中医原生态文化是沃土。因此，复兴中医学术、提升文化精神、完善中医素质都必须从复兴中医原生态文化做起，中医的原生态文化体系就是阴阳五行体系。

有破有立才有信，有破无立则生疑。

路 辉

丙申年丙申月壬戌日戊申时